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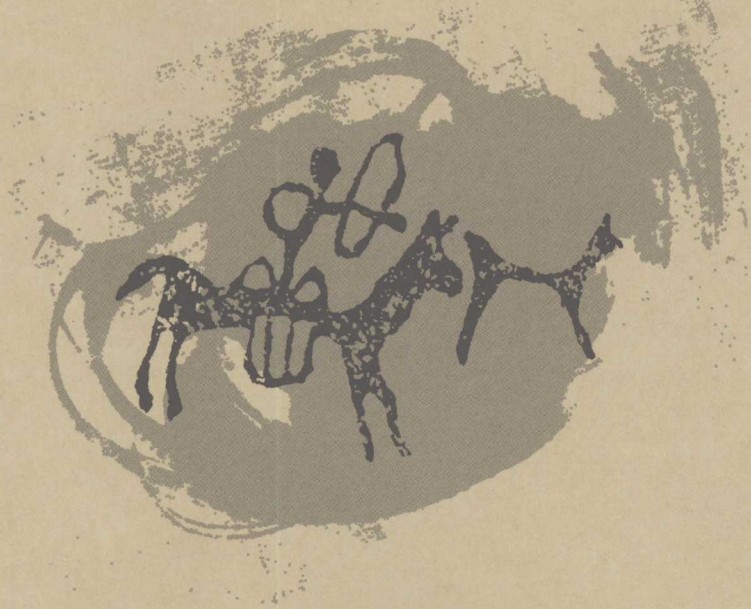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

方辉
主编

山东大学
东方考古
研究书系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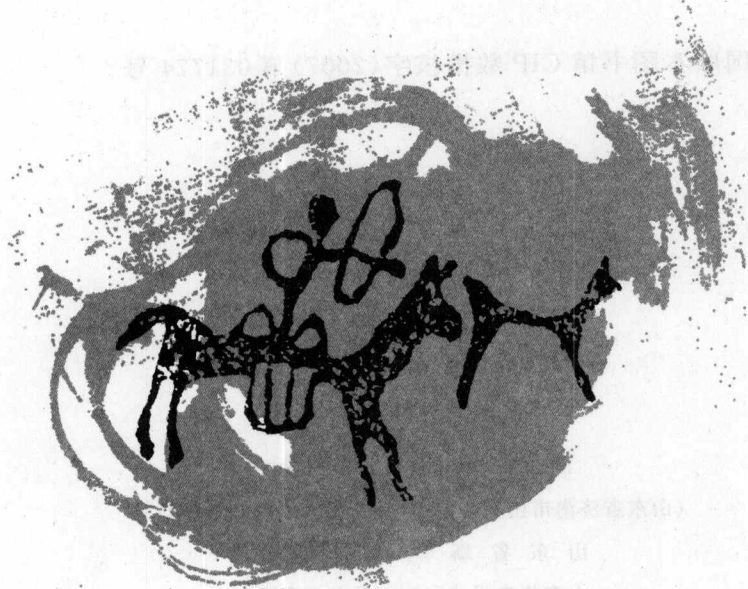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方辉
主编



山东大学
东方考古
研究书系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方辉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607-3346-3

I. 聚...

II. 方...

III. 聚落环境—考古学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77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680×980 毫米 1/16 28.5 印张 355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言

本文集收录的 16 篇论文,都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师生近年来的译作,其中除了靳桂云和王青两位教授的译文之外,其他多是由笔者选定英文原作而由有兴趣的同学分头完成的。这些文章大都曾在国内专业期刊上发表过,也有少数是首次刊布。此次结集出版,主要是为关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的学者提供查阅上的方便。

如果以美国学者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1953 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为起点,过去的五十多年可以说是聚落考古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也是成果辈出的一个时期。在我国,系统的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最早是在 1984 年由著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介绍传入的,而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有幸成为聚落考古理念的最早一批受益者之一。在这一理论方法的指导下,从 1995 年开始,我们与美国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后来是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行合作,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聚落考古的实践。这一合作项目的直接成果,是对时间跨越五千多年、面积超过千余平方公里这一时空范围内聚落形态的全面揭示;与此同时,通过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聚落考古在世界范围内迄今所取得的主



要成就。本文集所收录的若干篇文章,就是对这些成果的介绍,也有几篇文章是运用聚落考古理论对我国史前至历史时代早期社会发展所做的分析。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不同时代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体例有所不同,收录本文集时在体例上进行了统一。

聚落考古的理论源头之一是文化生态学。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关注,是聚落考古区别于以往以年代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考古学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环境考古起步较晚,但却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文集收录的有关环境考古的几篇文章,尤其是国外同行从地貌、气候等环境角度对我国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史前灾害场景所做的分析,凸显出环境考古在揭示和阐释早期人类遗存方面的优势。

希望这部文集能对关注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的学者有所助益。

方 辉

2007年3月20日

目录

001	聚落与景观考古学
015	考古学区域分析
046	美国聚落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
068	考古调查与考古研究
093	聚落形态调查与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
113	层级和社会组织
166	中美洲和前西班牙文明
193	由蒙特尔班国家形成的个案研究谈起
228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267	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
306	商代国家的经济形态
338	有关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方法
360	科尔沁草原史前时代的聚落与沙漠化过程 的环境考古学研究
372	重建白令海峡地区晚更新世的自然环境
388	古代中国的环境研究
402	日本东北地区史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426	人类狩猎行为的考古发现与阐释



聚落与景观考古学

[美]加里·费曼 著

方辉 惠夕平 译

聚落和景观研究方法以其在描述、理解进而阐释长时段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变化这一考古学的核心使命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重要价值,正在日益成为当代考古学关注的焦点。不过,尽管其重要性在当下的学术界越来越被看重,但采用这种方法所进行的综合性考古研究成果还是相对较少^[1]。但无论如何,就近代以前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而言,聚落和景观考古为我们全面透视古代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唯一且行之有效的宏观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地面调查。通过这种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并记录一个景观区域内古代人类生存和居住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的空间分布。对调查所发现地表遗存(如陶片、石制品、房址和其他建筑基址等)进行辨识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正确解释古代聚落和景观形态提供一个可以加以验证的基础。

一、历史背景

虽然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但考古调查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却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首先在美洲,在考古学家斯特伍德(Steward)于1938年所提出的重点解析(analytical emphases)理论的激励下^[2],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于1953年在秘鲁维鲁河谷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为美洲聚落考古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3]。与此不同,肇始于英格兰的景观研究方法,却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探寻聚落与其周围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不管怎样,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理性地从各种不同学科中吸收有益的养分。

(一)北美和英格兰早期考古调查的基础

美洲的聚落考古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摩尔根于1881年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对聚落考古发展影响深远的命题,即:北美地区的原住民所遗留下的建筑遗存是如何反映其社会组织结构的^[4]。然而,这一命题的提出,并没有对当时的考古学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致力于摩尔根所倡导的聚落与聚落社会行为方式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几乎是寥寥无几。当考古地面调查最早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的时候,也只是倾向于有选择地开展大量的随机性调查,其目的在于判断某个遗址是否具有进行考古发掘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福克斯(C. Fox)于1922年提出景观研究方法,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界定不同类型的聚落和它们所依附的环境(由土壤、植被、地形地貌等所决定)之间的关系方面^[5]。一般来说,这些早期的研究所依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对那些出自众多的个人或团队所采用的各种田野调查和发掘成果所做的概括,而不是来自自由独立的研究团队采用同一标准所进行的系统而全面的全覆盖式调查工作。同时需要指出,欧洲传统的景观研究更多地与罗曼蒂克式的



思维模式有关,这与源于北美地区传统的聚落形态的实证主义倾向有着显著区别^[6]。

(二) 聚落考古研究的发展历程

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球许多地区从事考古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们发现,单纯依靠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的单个遗址或社区的发掘来重建和解释不断变化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极为困难的。例如,1951 年费利普斯(P. Philips)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密西西比下游河谷地带的广大区域范围内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目的是通过对该地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的考古遗址进行研究,来揭示当地陶器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演变^[7]。

然而,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和最引人注目的考古调查工作当属威利等学者在秘鲁维鲁河谷进行的工作。在这次考古实践中,威利首次正式阐述了聚落形态研究在揭示古代人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和潜在的分析效能。他的视野已经不仅仅触及到对特定区域内生态环境与聚落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对区域内聚落功能类型的界定。除了在理论上的贡献之外,维鲁河谷的考古实践也是对考古方法论的一个创新。在西半球,他是第一个采用航空地形图对古代聚落遗址进行定位和记录的学者。尽管他的调查工作并不全都是徒步完成的,但他确实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对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遗址进行系统乃至全覆盖式的调查,为他进一步审视区域内不同种类遗址的变化幅度和聚落形态的历时演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上述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间所进行的聚落形态研究为此后几代考古学家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认识基础。这其中,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到 60 年代间,在全球的四个区域都开展了类



似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不管从哪方面说,在此后的考古学理论和实践中,不论是打着“新考古学”还是“过程考古学”的旗号对传统考古学进行的反思,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考古工作,都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后所建立的考古学理论框架,将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中长时段的行为变迁过程和基于人口(同时也是区域性)规模之上的文化嬗变上。这种研究方法取代了以往那种过分强调遗址的所谓典型性或文化类型的研究取向,使得我们在通过区域系统调查和分析来对特定区域进行考古学研究时,具有了将历时性研究同大量的遗址数量相结合的明显优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大规模的区域调查项目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间,区域性聚落形态研究主要是在人类早期文明起源的三个核心区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墨西哥高原和爱琴海地区)以及以丰富的考古遗存而著称的美国西南部地区先后展开。维鲁河谷调查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对安迪恩(Andean)地区的聚落形态调查工作的持续开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直到此后的一段时间,上述努力对该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才开始生根发芽^[8]。

从 1957 年开始,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M. Adams)和他的同事们驾驶吉普车对近东地区的沙漠和平原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将发现的考古遗存和地表遗迹在地形图上标示出来^[9]。在对数百平方公里区域所进行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这项开创性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大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复杂化进程的解析和研究。此后不久,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在墨西哥高原的两个最大的河谷地区(墨西哥盆地和瓦哈卡谷地)展开,这两



个项目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持续性区域调查工作。采用全覆盖式的工作方法,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工作,他们以徒步的方式调查了墨西哥盆地的一半地区和几乎整个瓦哈卡谷地。上述地区拥有古代美洲最早和最广阔的城市遗存。他们在上述地区进行的系统考古调查,成功揭示了当地聚落形态历时演变的情况^[10]。

在爱琴海地区,区域调查的组织者决定通过系统调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对那些已经具有长期发掘历史的重要遗址进行定位^[11]。在这个拥有数十年考古发掘经历和丰富历史文献的地区,区域研究方法同样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期间,聚落形态研究在美国西南部多种不同的生态背景下展开,主要目的是探讨考古遗址的不同分布与其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在整个景观区域内不同聚落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历时变化。在上述调查的每一个区域,调查的面积越大,聚落形态就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个地区内某个聚落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同其他聚落规模的逐渐缩小和数量的减少密切相关的;特定区域内聚落形态的变化趋势总是通过聚落的起伏消长来体现。

上述调查工作的主要区域(包括安第斯山的部分地区)都位于干旱或半干旱的环境中。这些地区一般说来缺少茂密的地表植被,这无疑保证了系统调查工作的优质和高效。因此,在此类地区地表所收集到的信息也是最为可信的。反过来,这些发现对于那些由本地区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们所进行的长期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他们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学术上的回报。正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研究项目所带来的最为基本的收获,是研究者在经年的田野调查工作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巨量的信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12]

(四) 较小规模的聚落形态分析

虽然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最为广泛地适用于区域性研究,但在涉及古代人类的居住面、聚落结构和社群等问题的研究中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概念和原则。对于单个的活动面和房屋居住面的遗物布局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区分出特定的行为功能区(例如炊煮、食物备料和制作工具等),这些活动区位于特殊的建筑内^[13],或不同的层面上^[14]。在很多方面,现在所强调的家居考古(household archaeology)就是聚落形态研究的延伸。家居考古和聚落考古都增强了学术界对于非精英阶层(nonelite sector)存在的复杂社会研究的兴趣,也激励着学者们更加关注社会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所谓整体性标型化的界定方面。

(五) 聚落与景观考古

对于研究介于区域聚落形态和家居考古之间的或可称之为中等规模的遗址群或社区而言,聚落形态方法是通过对建筑遗存和人工制品在诸多遗址上的分布加以比较来实现的。这类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聚落内部不同行为功能区的空间分布^[15],以及这些功能区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乃至功能区的历时变化情况^[16]。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说,详细的聚落形态图和具体的遗址平面图可以使我们洞察特定区域内共时的城市和社区之间的异同,也有助于我们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更易于理解和阐述聚落形态的多样性。

二、当下研究的策略和争议

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方法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易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于贯穿于考古学研究中



文化变迁和多样性的“标准化”观念,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加以弱化。在全球许多地区,区域性聚落形态(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称之为大区域)研究方法在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系统方面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优势。不仅如此,聚落形态研究方法还可为估算一定时期内的人口分布、规模和变动等统计学数据提供基本信息,而这些资料在以往单靠考古发掘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不过,目前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例如,区域调查的环境限制,不同调查方法的优劣,文化编年的运用,人口估算的程序以及对于对于聚落形态调查所获数据的有效阐释手段等。

(一)环境限制

尽管系统的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方法已经在多种环境条件下付诸实施,其中既有地面植被丰富的地区如危地马拉的佩特恩(Petén)、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区和北温带的欧洲,也有上文提及的位于干旱或半干旱环境条件下的其他地区。有些地区的调查还持续多年,覆盖面积颇大。一般说来,系统调查方法更加适合于那些缺少浓密植被覆盖的地区,因为这种条件下更容易发现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与建筑遗存。而有些考古学家还尝试采用多种方法对那些无法进行徒步穿行的遗址进行调查,这些方法包括分析地球卫星的内插图像(interpolation),详细解读航空摄影,利用地下探测程序来确定是否有聚落的存在等。通常在每一个研究区域,考古学家会根据计划调查的面积、本地区的地形特征和区域内古代人工制品的分布密度(通常为不易腐烂的遗弃物)等对具体的田野操作方法(如调查人员的间距与密度)做出适当调整。例如,使用陶器制品并过着定居生活的人们一般会比经常迁徙的族群留下更多的遗物。后者通常会使用较多的易腐烂的容器(如篮子、布袋等)。因此,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聚落形态和景观研究的方法进行调查,这类遗址被发现的几率要远远小于长期定居者(尤其是掌握制陶技术的聚落)所留下的遗址。

(二)调查方法论与抽样

聚落形态研究伊始,考古学家就在实践中采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调查方法,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别还是表现在全覆盖式调查与随机抽样调查方面。前者主要靠同一支调查队伍的成员对调查区域进行系统、全面、全覆盖式的调查。为了确保能够全部覆盖整个调查区域,调查者通常会根据被调查区域内的地表植被、地形地貌和地面考古遗存的密集程度调整调查队员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相邻两名队员之间的距离保持在 25~50 米。不可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的人工遗物有可能被错过。但借助于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够对特定区域内整个聚落形态的变迁有一个合理而清晰的认识。有时,亦可采取抽样随机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对研究区域内的某一组成部分进行重点解析。这种情况下调查队员的间距应该更为密集一点(这种方法通常只能针对整个调查区域中的一部分)。

考古学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抽样考古调查的设计方法,这种调查方式的选择可能是随机的,也可能根据相关制约因素(包括环境变化等),对被调查区域进行逐层解析。尽管如此,不管何种抽样调查方法,这种调查方式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该怎样根据从局部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去推测整个区域内聚落变迁的事实,而这正是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抽样调查对于估算特定区域的遗址数量比较有效,但若要界定各个遗址之间的空间距离,或者对聚落的不同功能加以界定,这种调查方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适当的抽样调查方法只能根据调查者具体的课题目标来制定,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研究者的千篇一律的调查方式。有些



抽样调查方法在探讨特定区域内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某种特定的研究目标上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三) 年代学的限制及相关探讨

聚落考古的一个主要优势便是它为我们探讨某个特定的景观区域内古代人类活动遗存的分布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视野更为开阔的研究方法,尽管这种变化的时间跨度和精度还要依赖于当地考古编年学的水平和质量。对调查中发现的某个遗址的年代判定必须建立在采集品的复原和本地区典型器物的演变规律的基础之上。由于地面调查所获得的遗物通常已经脱离了它最初被废弃或埋藏的环境,因此,更加精确的绝对年代断代法对聚落形态研究的直接影响似乎并不太大,因为这种年代学通常是建立在遗物的最初埋藏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借助于间接的时代风格,如共时有序的人工制品(典型陶器),也可以使已有的考古编年更加趋于精确。

在许多地区,考古编年的精度有时只能以百年或数百年为一个年代单位。因此,一些曾被短暂居住的遗址可能会被人们认定为与其他遗址同时共存的遗址,而实际上它们有可能只是先后相继的关系。同样,对一些遗址中特定阶段的实际居住面积的估计也有被夸大的可能,因为古代遗址往往会因为历史上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被扰动从而难以明确区分。当然,我们应当尽量减少这种研究中的失误。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本身的存在并不能够否定聚落考古在长时段居址研究中区域视角的重要性,而一般说来,对古代聚落形态的认识只能从系统的考古调查中获得。尽管这种来自于考古调查的粗线条的观察无法向我们提供通常考古发掘所能获得的某些具体细节,但它为我们探讨古代社会人口规模的变迁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这是单纯的考古发掘所望尘莫及



的。对于古代社会的全面详尽的了解,最终是建立在大规模的系统调查与选择性的发掘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四) 人口推测

过去的半个世纪,在考古学理念和思潮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其表现是由对标准化的古代社会的基本思考开始向着更加注重人口问题的视角转变。但是,如何定义古代社会的人口、人口的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模式,是一项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对古代社会系统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而其中最为基础的资料和数据,无疑是有关特定地区内人口的规模、分布及其变迁情况的信息。然而,考古学家究竟该用何种手段对某个特定时期内所获的地表遗物的密度及其分布进行分析,以便能够准确推测当时的社区和人口规模,学者间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一般说来,考古学家常常统筹考虑基于经验层面所得出的聚落的面积和聚落范围内调查所发现的人工制品,对所研究地区的人口规模做出判断。当对区域内每一处聚落的人口统计工作完成以后,那么,估算全区的人口规模便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人口统计的因素在各个地区间是不同的,因为社区人口密度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会有所差异。由于诸多因素如年代学的制约、遗物埋藏的过程、人为和自然的扰动和破坏等的影响,目前我们对古代社会所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技巧还是相对比较粗糙的。尽管区域系统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应用于准确全面地人口统计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但这种方法已经为我们进行广大时空范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是其他任何方法目前尚无法做到的。

(五) 区域调查数据的阐释

除了进行人口趋势估测、遗址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的



研究之外,考古学家还采用了其他一系列方法来分析和阐释区域调查所获得的大量数据。向来注重古代人类同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景观研究法,继续在较小规模的考古实践中传承着自己的传统。这种研究经常会详细考察特定条件下遗址的替代情况和聚落内景观遗存的状况以及这种取代关系背后的含义^[17]。与此同时,一些景观研究开始将视野投向古代耕地的特点以及与其相关的土地构成和利用情况。

与此不同,有些聚落形态研究则使用了一系列重在解析和阐释的新策略。大体来说,这些新策略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定量分析,关注的问题所涉及的信息量也更为宏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18],一套产生于考古学科之外的研究模式已经开始在衡量和比较不同的考古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对这种研究模式所采用的假设已经在学者间引起了争论,它究竟是否完全适合于研究工业化之前的古代社会目前尚未可知。因此之故,即使在预期研究成果与实际发现达到相当程度契合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由不同研究方法所导出的相似结论)的疑问还是会产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考古学理论建设力图结合具体的考古遗存重塑和扩展上述理论模式,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背景考察,但进展非常缓慢。沿着这一脉络,强化景观与聚落形态研究的整合,有助于我们认识曾经主宰着古代社会广阔时空范围内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网络的基本情形。

三、展望:聚落考古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属性在于其能够为观察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长时段与宏观的视野。了解不同社会的形成、演变及其逐步多样化的过程,需要一种区域性人口研究的视角(和基于不同规模的其他优势)。在过去的